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NICHOLAS
KALDOR

[澳] 约翰·金 著 贾晓屹 张军 译

尼古拉斯·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

尼古拉斯·卡尔多

[澳] 约翰·金 著 贾晓屹 张军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古拉斯·卡尔多/(澳)金著;贾晓屹,张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ISBN 978-7-5080-5644-9

I.①尼… II.①金… ②贾… ③张… III.①卡尔多,N.(1908~1986)-经济思想-研究 IV.①F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904 号

Nicholas Kaldor by John E. King.

Copyright © John E. King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Nicholas Kaldor* by John E. King.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John E. King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John E. King of the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英文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于 2009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0498

尼古拉斯·卡尔多

(澳)约翰·金 著

贾晓屹 张 军 译

策 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 版: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230 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Contents

第 1 章 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	1
1.1 卡尔多计划拯救世界	1
1.2 布达佩斯、柏林、伦敦和剑桥	3
1.3 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	10
1.4 卡尔多的 60 年经济学生涯	15
第 2 章 并非十年噩梦	19
2.1 宏观经济学、资本和价格	19
2.2 均衡 (1934 年)	25
2.3 福利 (1939 年)	28
2.4 投机	33
2.5 周期 (1940 年)	37
第 3 章 卡尔多的战争	43
3.1 从伦敦到剑桥	43
3.2 如何支付战争	45
3.3 宏观经济学家们的解释	48
3.4 除非现在就计划	53
3.5 贝弗里奇计划一：福利国家	56
3.6 贝弗里奇计划二：和平时期的充分就业	58
3.7 战 后	64

第4章 重返理论界	69
4.1 推广《通论》	69
4.2 重来的趋势和周期	72
4.3 收入分配的替代理论	73
4.4 卡尔多的增长思想：第一增长模型	79
4.5 卡尔多的增长思想：第二增长模型	82
4.6 卡尔多的增长思想：第三增长模型	84
4.7 理论、历史和政策	89
4.8 高论的结束	93
第5章 英国经济的灾难：1964~1979年	95
5.1 灾难的开始（1945~1951年）	95
5.2 卡尔多的社会主义	104
5.3 “浪费的十三年”（1951~1964年）	108
5.4 第一届威尔逊政府（1964~1970年）	111
5.5 理论和实践	115
5.6 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1974~1979年）	122
5.7 定论	125
第6章 卡尔多和第三世界	127
6.1 欠发达国家的问题	127
6.2 发展经济学家	130
6.3 政策分析	136
6.4 税收顾问	140
6.5 滞胀以及关于不稳定性和增长的北-南模型	144
6.6 卡尔多从发展中学到了什么	151
第7章 货币主义之灾	153
7.1 货币数量论错在哪里	153
7.2 新货币主义	159
7.3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货币主义	164

7.4	一位愤怒的老人	169
7.5	《通论》的局限性	174
7.6	得不偿失的胜利	179
第8章	均衡经济学的不相关性	181
8.1	经济学的危机	181
8.2	均衡经济学的不相关性	183
8.3	卡尔多的方法论	188
8.4	没有均衡的经济学	193
8.5	卡尔多和后凯恩斯主义	199
8.6	从局内人到局外人	206
第9章	卡尔多在当年和在当代	209
9.1	其他人的说法	209
9.2	优点和弱点	215
9.3	卡尔多在当年和在当代	225
参考文献		229
译后记		262

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

1.1 卡尔多计划拯救世界

1984 年 5 月，75 岁高龄的尼古拉斯·卡尔多在米兰的博科尼大学发表了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世界经济增长和停滞原因”的马蒂奥里系列讲座。此前他已经做过四次演讲，分别是“均衡理论和增长理论”、“增长理论的其他替代方法”、“多领域均衡问题”以及“地区间和国际间竞争的影响”等。现在，该是阐明这些理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的政策含义的时候了。

当时的世界形势非常糟糕。1984 年是世界经济陷入滞胀（描述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相伴随这种状态的新词汇）的第 11 个年头。在石油生产国卡特尔组织欧佩克的操纵下，1973 年的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并达到顶点，从而引起商品价格爆炸性上升，1945 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近 30 年的长期繁荣被终结（霍布斯鲍姆，1994 年，第 14 章）。由于自我标榜为“自由市场”的政府（首先是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随后是美国的里根

政府)于1979~1982年间执行新货币主义政策,结果世界经济只是出现了短暂的震荡性恢复,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下滑(史密森,1996年)。卡尔多长期以来就批评货币主义这种经济理论。1979年之后,他致力于把货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加以攻击。

在马蒂奥里系列讲座中,卡尔多建立了四个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准则。“首先是包括一组固定的财政支付差额目标和‘充分就业’预算在内的配套财政行为。”卡尔多辩称,在缺乏一个国际上协调一致的财政扩张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只会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严重障碍”(卡尔多,1996年,第87页)。其次是把“利率尽快降下来,能降多少降多少”。再次,通过由新的世界货币资助的国际调节性库存储备来“阻止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卡尔多建议,欧洲各国可以使用既有的共同农业政策和原始的欧洲货币埃居(ECU,欧元的前身)来着手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同上,第87~88页)。最后,“由于通过部门(或行业)集体合同所建立的工资定价体系导致了充分就业状态下经济具有的长期通货膨胀趋势”,要克服这一点至关重要(同上,第88页)。货币和财政对总需求的限制会产生明显的失业,但是却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卡尔多总结道,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实施一项收入政策:“建立一种社会主体——工人、经理层和政府——之间持续磋商的制度,以达成关于国家收入分配的社会一致性意见,这种收入分配充分考虑了公平性以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货币稳定的可持续性。”(同上,第90页)预算赤字、货币贬值、稳定商品价格和收入政策,这些清楚地表明,卡尔多是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潮流的。拉菲尔·马蒂奥里系列讲座是由意大利商业银行设立的,目的是纪念它杰出的管理者和主席。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两年中,卡尔多在日内瓦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他在那里认识了马蒂奥里,此后两人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卡尔多的系列讲座总结了他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发表经济理论著作以来多产的学术生命中的所有成果。卡尔多对经济政策与

众不同的、非常规的视角源于对主流经济学的尖锐批评，他在以前的演讲中称主流经济学是“荒谬的”（同上，第7页），而且认为主流经济学表现出：

一种自负的、虚假的准确性或“科学性”，使用了高度精确的数学方法来证明那些对现实世界来说没有任何解释价值的命题，原因很简单，主流经济学使用的先验公理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状况没有任何关系。使用数学不但无助于提升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反而削弱了其科学性。（同上，第21页）

卡尔多的结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立真正科学的宏观经济学，去解释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法，而相对于这一时期，1945年以来的经济学一直在倒退。

凯恩斯最伟大的信徒（虽然对凯恩斯也有很多批评）之一，尼古拉斯·卡尔多于1986年9月30日在剑桥大学逝世，距离卡尔多的马蒂奥里演讲只有两年多一点。剑桥大学出版社根据瑟尔沃尔的略传以及费迪南多·塔尔盖迪内容广泛的文献目录，花费了十年才把这些文献结集出版。这是对20世纪最有独创性的、最富有煽动性的、非传统的经济学家之一——尼古拉斯·卡尔多的最令人难忘的纪念方式。

1.2 布达佩斯、柏林、伦敦和剑桥

尼古拉斯·卡尔多于1908年5月1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家兴盛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① 他的父亲朱利叶斯是一名律师，而且他

① 卡尔多的生平可以参阅帕西内蒂（1983年）、瑟尔沃尔（1987年）和塔尔盖迪（1992年）的著作，也可以参阅卡尔多（1980年a，1986年a，1986年b）的自传材料。最详细的资料是卡尔多1984年3月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玛尔古佐的对话全文（卡尔多，1986年b）。除非另外说明，相关内容都是我自己从这篇意大利文章中翻译过来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有卡尔多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NKP 3/138）。——原书注（除非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原书注）

最初希望年轻的尼古拉斯也能够进入律师业，“虽然我^①内心里渴望成为一名作家”。卡尔多是家里唯一的一名男孩，他的两位哥哥在他出生之前就夭折了。卡尔多的学生兼亲密朋友卢吉·帕西内蒂报告说，“拥有特权的童年时代影响了卡尔多一生中的态度和举止，这有助于解释卡尔多充满活力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散漫的个性”（帕西内蒂，1983年，第335页）。卡尔多自己回忆了一战刚刚结束时的匈牙利：

社会体制从君主制转为自由共和国，后来共产党又执政四个月，接下来是军事独裁统治，不久为了迎合胜利的西方强国的意愿，又采取了温和路线的议会制。这些变化让我困惑，使我对主导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充满兴趣。（卡尔多，1986年a，第11页）

卡尔多一家1923年夏季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度假，这使他亲身感受了德国的极度通货膨胀，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当时他是布达佩斯精英高级中学的学生，这是一所国立学校，教师们训练有素，而且其他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这些教师们制订的。与卡尔多同年级或稍早的著名学生包括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出生于1902年，196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斯·柯蒂（出生于1908年，与卡尔多同岁）、爱德华·特勒（同样出生于1908年）、历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出生于1891年）。此外还有托马斯·巴洛格（出生于1905年，比卡尔多大三岁），后来也移居英国，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由于20世纪60年代担任哈罗德·威尔逊所领导的工党政府的顾问，从而成为一名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1925年，卡尔多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进入柏林洪堡大学读经济学。在这里他倾听了库尔特·舒马赫的讲座，库尔特·舒马赫是弗里茨·舒马赫的父亲，后者与卡尔多一道成为威廉·贝弗

^① 指卡尔多。——译者注

里奇爵士关于建立战后英国充分就业政策的技术顾问。^①此外，他还遇到了前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沃纳·松巴特。卡尔多对教学质量没有特别的印象，半个世纪后，卡尔多告诉克里斯蒂娜·玛尔古佐，“在德国读大学，意味着你要在一场场讲座中漫游，没有任何纪律和清晰的课程计划可以遵循”。他在柏林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新闻记者的工作（得益于他流利的德语），以补贴他父亲给他的零用钱不足：

18岁那年，我成为一家匈牙利报纸的官方驻外记者，因此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正常情况下，很多地方是一年级的学生不能去的。每星期五的下午，当时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会邀请所有得到授权的外国记者去他的外交部喝茶。我同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交谈过，也进行了很多访谈，但是我在研究上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卡尔多，1986年b，第29页）

卡尔多不久就认识到，如果他想在经济学上取得进步，就必须进行系统的研究课程训练。他在德国没有找到这些，但是在英国找到了。

因此，1927年春季，卡尔多前往伦敦，打算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学期。他决定留在伦敦经济学院，并于1927年10月被正式录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学生；20年后当他辞职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经济学准教授。^②在伦敦经济学院，他首先受到美国风格的马歇尔主义者艾林·扬的影响，^③然后受到了下一任经济学主席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影响。艾林·扬1926年从哈佛大学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不到三年，在1928~1929年冬季不幸感染了肺炎。卡尔多回忆道：

① 参见第3章第3.6节。

② 但是他继续参加柏林洪堡大学的考试，并在1929年获得学位（塔尔盖迪，1992年，第2页）。

③ 关于艾林·扬，可以参见布力特（1995年）以及卡尔多关于1928~1929年间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座的注释（布力特，1990年；桑迪兰兹，1990年）。

尽管如此，他的讲座和研讨班对我后来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对抽象系统的质疑，从本质上说，是对采用理论性分析工具来试图阐明实践问题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卡尔多，1980年a，第viii页）。

扬最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是他关于报酬递增和经济发展的论文（扬，1928年），这篇论文“尽管主要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全理解，但是仍然引起了轰动”（卡尔多，1980年a，第viii页注释2）。卡尔多在他最早也是最具独创性的论文中大加利用杨的理论（卡尔多，1934年a），^①并且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一再提及报酬递增的含义。1977年卡尔多写道：

扬的理论向我们表明，市场的主要功能是传导经济变化所产生的刺激，通过扩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范围来创造更多的资源，而不是使既定数量的资源得到最优分配。他还向我们表明，报酬递增不断自我产生并“以一种加速的方式来自我繁衍”^②。因此，那些描述使经济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的力量分析，都不能真正描述市场的发展是如何引起经济永久性变化的。（卡尔多，1978年c，第xxv页）

卡尔多最终真正与均衡经济学决裂，主要归功于他的第一位老师的长期影响（参见第8章）。我们可以从卡尔多为自己1928～192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所作的注释中得知他从扬那里学到的东西（卡尔多，1990年）。^③

扬最重要的课程被他的继任者莱昂内尔·罗宾斯抛弃了，后者是坚定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倡导者。

罗宾斯很年轻，派头十足，充满激情（他任职的时候只

① 第2章第2.2节将讨论这篇论文的一些细节。

② 这是对扬（1928年，第533页）的直接引用。

③ 摘录可以参见布力持（1990年）。

有30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和经济科学研究上。他把精力和活力用在了学生身上,认为学生们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正好有一打学生主修了“分析经济学”,我们作为他的第一批学生非常幸运,几乎全部为他所倾倒。(卡尔多,1980年a,第viii~ix页)

与扬不同,罗宾斯是一位瓦尔拉斯主义者而不是马歇尔主义者。他在维也纳跟随路德维格·冯·米塞斯学习的时候,完全被奥地利学派对一般均衡理论进行的变形所吸引。^①卡尔多最初是罗宾斯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年轻同事,这使卡尔多“完全掌握”了“广义上的”按照边际产量进行分配的理论,就像维克赛尔和威克斯蒂德所详述的那样。罗宾斯信仰这套理论,“如同传教士一般狂热地皈依于这套理论,并传授给他人”,因此,卡尔多“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这套理论,如果在其他环境下,我肯定会犹豫的,而这种犹豫将会妨碍我去真正掌握该理论的内容(就像其他评论家所遇到的妨碍那样)”(同上,第ix页)。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时候,正是卡尔多读学位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头的中间。他一路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考试(除了统计科学方法这门他最弱的课程)。1930年,他被录取为研究生,1932年获得了助教职位,直到1938年才被提升为学院的全职讲师。^②学院关于经济学系的记录记述了卡尔多的职业升迁。1930年秋季,卡尔多获得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生奖学金,每年200英镑外加学费。1931年8月1日,他成为经济学助教。两年之后,他和两位同事转为大学的正式教师。当时,他正受到另外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影响,哈耶克在1931年受罗宾斯的邀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在政治上,哈耶克是一位19世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哈耶克当时是一名铁

① 参见罗宾斯(1971年)所记录的奥地利学派对他早期思想的影响。

② 参见瑟尔沃尔(1987年,第一章)。

杆的瓦尔拉斯－维克赛尔新古典经济学者。^①简单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的思想对卡尔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可以参看本书第2章。

卡尔多在伦敦的这些年非常快乐。他教授涉及面广泛的理论和应用课程，这些课程常常（并不是全部）与他的研究兴趣相关。1939年以前，他教授的课程包括经济理论，生产、资本和利率理论，经济理论的更深层次问题，关税、公共财政和商业周期理论。当战争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剑桥的时候，他仍然教授国际贸易和外汇课程、动态经济学框架、战争经济学问题以及（受到凯恩斯的鼓动而讲授）分配理论（瑟尔沃尔，1987年，第32、77页）。卡尔多在1979年写道：“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伦敦经济学院，到处弥漫着富有创造性的、令人紧张和兴奋的氛围，对当前这一代学生来说，已经很难再感受到这种氛围了。”在教职员工中，除了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还有一些光彩夺目的青年研究生。他们一起来应对大萧条（尤其是1931年和1932年）给所有经济学家带来的挑战。那是一个充斥着无休止的讨论的时代，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讨论，吃饭时讨论，散步时讨论，周末仍然在讨论（卡尔多，1980年a，第xi页）。当时，卡尔多最亲密的朋友是莫里斯·艾伦（当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非常保守的执行董事）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其他年轻的同事包括托马斯·巴洛格（来自于布达佩斯的模范预科大学）、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以及另外一位天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

卡尔多和约翰·冯·诺伊曼的友谊开始于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暑假，卡尔多记得，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午餐时在一家酒店的台阶上（卡尔多，1986年b，第43页）。他把维克赛尔的经济学介绍给冯·诺伊曼，经常同冯·诺伊曼讨论经济学问题，后来还安排翻译冯·诺伊曼关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论文，并使该论文发表在

① 哈耶克后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参见卡德维尔（2004年）。

《经济学研究评论》上（冯·诺伊曼，1945～1946年）。卡尔多认为，“现在看来，相比于回答问题而言，约翰尼^①更喜欢提出问题，但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喜欢与人聊天”（卡尔多，1989年b，第vii页）。卡尔度和希克斯的谈话要严肃得多。希克斯向卡尔多介绍了瑞士的货币主义宏观学派，“这第一次使我认识到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主义方法的缺点，因此，当三年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时，我很容易地就转向了凯恩斯”（卡尔多，1989年b，第xi页）。卡尔多皈依了凯恩斯，而且几乎同时回归了他年轻时的社会主义信仰，这使得他同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这些将在第2章和第3章详细描述。

后面的章节将会详细讨论卡尔多以后的职业发展。现在是强调一些主要里程碑的时候了。卡尔多1947年从伦敦经济学院辞职，接受了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计划部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委员会由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纳纳·缪达尔负责。在这里，卡尔多遇到了拉菲尔·马蒂奥里。在包括蒂博尔·巴纳德、罗伯特·尼尔德、P. J. 凡登等人在内的团队中，卡尔多负责起草委员会对于欧洲经济形势的调查以及1947年和1948年的经济展望，又同人合写（卡尔多写作了大多数）了一份关于促进充分就业的国家和国际测量的联合国报告。1949年秋季，卡尔多重回学术界，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这一职位他一直保持到去世。同时，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讲师；1951年被提升为高级讲师，1966年被授予（迟来的）个人讲座教授。他教授的科目范围比起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窄得多。在他的讲座上，卡尔多集中讲授价值和分配理论、动态经济学和（1952年开始的）增长经济学。他也教授经济学原理和当时的经济问题（瑟尔沃尔，1987年，第111页）。1956年，卡尔多成为一名伟大的旅行家，他在公休日访问了印度、中国、智利和美国。后来，他成为三大洲的七个国家政府的税务顾问。1975年，按照剑桥大学的要求，67岁的

① 英文中约翰的昵称，指约翰·冯·诺伊曼。——译者注

卡尔多从剑桥大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仍然保留了他国王学院研究员的职务。退休后的卡尔多更加繁忙，马不停蹄地旅行，在数不清的研讨班和会议上发言，每年发表五六篇论文，为他的随笔合集写序，从1979年开始，他通过上议院的工党席位毫不留情地攻击撒切尔主义的愚蠢行为。

1.3 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

卡尔多从来不惧怕辩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卡尔多作为威尔逊政府顾问期间，他始终处于公众的视野之内，经常因其支持的危险而激进的提议而遭到保守派评论家们的批评。以工业为目标的商业游说集团制作了宣传册，以攻击卡尔多和他的匈牙利同事——刻薄的托马斯·巴洛格。宣传册公开指责卡尔多的“税收偏见”，卡尔多建议印度政府引入一种个人支出税收，其最高的边际税率高达“百分之三百”（乔治和比莱，1964年，第3页；楷体部分为原文强调的内容）。毫不奇怪，卡尔多的这一建议非常不受欢迎，他给锡兰和加纳这些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府们的建议也是如此，“目的是为了增加税收，以弥补由于过重的政府支出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赤字”。在这两个案例中，“卡尔多的建议带来的是税收过重的骚乱”（同上，第5页）。^① 宣传册总结说，他们是一群危险分子，他们对劳动者的影响是极其有害的。“在一个以教条主义著称的政党中，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卡尔多和巴洛格的重要影响力必将导致严厉的税收政策、国有化、更多的计划、行政许可和控制”（同上，p. 8）。这是对卡尔多和英国工党（以非教条和反知识分子而臭名昭著）夸张式的讽刺，但是在商界却有很大的市场。随着1964年10月威尔逊的工党政府上台，巴洛格和卡尔多就成为让（保守派）小孩们都闻之

^① 卡尔多对这些经历的自我描述将在第6章第6.4节讨论。

不敢啼哭的名字了。

我的前同事拉兹罗·查波（来自于布达佩斯）过去常常给我讲一个故事。1986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举行最高领导人会议。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次冷战行将结束，和平即将到来。然而，会议之前，各方却都存在猜疑，尤其是前苏联对美方存在很大疑问。每次会谈的时候，里根都由一队带着墨镜的彪悍保镖陪同着。有一天，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地看到这队保镖带着一个巨大而且看上去很沉重的手提箱。戈尔巴乔夫问道：“总统先生，这是什么？”里根相当尴尬地看着他说：“主席阁下，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的顾问担心我在这些会谈中的安全。因此，我必须警告你，这个箱子里面装着末日武器。当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将被引爆，从而无情地毁灭整个地球上的生命。”^① 戈尔巴乔夫沉默地坐了一分钟，接着在谈判开始前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第二天，轮到里根开始纳闷了。站在戈尔巴乔夫后面的克格勃正吃力地扛着一个巨大且沉重的箱子，比美国的更大、更重。“米哈伊尔，米哈伊尔。”里根开始说，但是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我的顾问们也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我有义务告诉你，手提箱里面是两个匈牙利经济学家……”

这两个经济学家，被私家侦探们蔑称为巴尔多和克洛格^②，此外也被称为佛陀和害虫^③，这个老掉牙的笑话起源不详，也许可以追溯到卡尔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当时他为后来的工党财务大臣休·道尔顿工作。在道尔顿1950年的日记中曾经提到这两个绰号。继任的财务大臣丹尼斯·希利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两个来自匈牙利的可怕的双胞胎，尼基·卡尔多和托米·巴洛格，休·

① 斯坦利·库布里克在1963年讽刺冷战的电影《奇爱博士》中有类似的镜头。

② 英文拼写分别为Baldor和Kalogh，由Kaldor和Balogh两个名字交叉搭配得到。——译者注

③ 英文拼写分别为Buda和Pest，合起来就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译者注